

清代台灣城鎮研究

唐次妹
著



台灣研究



清代台灣城鎮研究

唐次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台湾城镇研究 / 唐次妹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195-831-0

I. 清… II. 唐… III. 城镇—地方史—研究—台湾省—
清代 IV. K295.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7638 号

清代台湾城镇研究

作 者	唐次妹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 本	720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5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831-0/K · 137
定 价	48. 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	(3)
第三节 本书分析框架	(7)
一、概念定义	(7)
二、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9)
第二章 台湾的地理、人文环境与城镇	(13)
第一节 台湾的地理环境与城镇	(13)
一、台湾岛的地质和地形条件	(14)
二、气候、土壤、农作物条件	(16)
三、河川、水利及交通条件	(17)
第二节 移民开发与城镇	(20)
一、移民原因	(21)
二、大陆移民与台湾的开发	(23)
三、移民聚落及其特征	(25)
第三节 商品经济与城镇	(28)
一、移民的重利精神和商业传统	(29)
二、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镇的发展	(31)
第四节 清以前的台湾城镇	(39)
一、荷据时期台湾市街及其形态	(39)
二、郑氏时期台湾市街的发展	(43)
第三章 开港前台湾城镇及其网络	(45)
第一节 开港前的台湾城镇	(45)
一、清初(单口对渡时期)的台湾城镇	(45)

二、清中期（多口对渡时期）的台湾城镇	(54)
第二节 开港前台湾城镇类型	(63)
一、行政中心城镇	(63)
二、港口市镇	(67)
三、内陆和山区市镇	(73)
第三节 开港前台湾城镇网络	(76)
一、开港前台湾城镇的空间分布及其密度	(76)
二、开港前台湾城镇的层级结构	(77)
第四章 开港后台湾城镇及其网络	(101)
第一节 开港后的台湾城镇	(101)
一、港口城镇的发展	(101)
二、内陆和行政中心城镇的发展	(115)
三、产业勃兴和专业性市镇的兴起	(119)
第二节 开港后台湾城镇网络	(129)
一、经济重心的转移和南、北两大经济圈的形成	(129)
二、两大区域核心城镇的扩张	(132)
三、开港后台湾城镇网络	(134)
第三节 台湾城镇及其网络发展的动力	(146)
第五章 台湾城镇管理	(152)
第一节 台湾地方官僚机构与城镇管理体系	(152)
一、文官系统	(152)
二、武职系统	(157)
三、各级官僚组织在城镇管理中的相互关系	(158)
第二节 台湾乡保制度与城镇管理体系	(162)
一、差役、地保及其管理职能	(162)
二、保甲、团练及其管理职能	(163)
第三节 台湾民间自治组织与城镇管理体系	(166)
一、官府无为与民间力量的兴起	(166)
二、城镇管理中的民间自治组织	(169)
第四节 台湾城镇管理体系的二元结构	(182)

第六章 台湾城镇功能	(188)
第一节 相对滞后的商品生产功能	(188)
一、台湾城镇商品生产功能的初步发展	(189)
二、台湾城镇手工业生产的主要行业	(190)
第二节 发达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功能	(194)
一、各级城镇商品交换和流通网络的形成	(194)
二、城镇在商品交换和流通网络中的作用	(196)
三、城镇商品交换和流通功能的扩张	(198)
第三节 行政、文教和宗教功能	(203)
一、行政和文教功能	(203)
二、宗教功能	(208)
第四节 突出的安全和防御功能	(212)
一、城垣的建设	(212)
二、其他防卫设施	(214)
第五节 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功能	(217)
一、台湾城镇社会保障的承担者	(217)
二、清代台湾城镇社会保障的主要项目	(220)
三、与徽州、苏州社会保障事业的比较	(229)
第七章 结 语	(232)
附录	(236)
参考文献	(243)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缘起

城镇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象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从商业的角度而言，城镇实际上就是市场，各级城镇就是各级市场。市场是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城镇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商业活动的载体。实际上，城镇是人口和商业聚集之处，是社会经济集中发展的地方，是承担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功能的较高级市场所在地。商业活动越频繁、商品交易和流通的量越大，那么市场越繁荣，城镇规模越大，在市场体系中的层级就越高。反之亦然。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过程促进了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城镇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为商品的集中生产、交换和流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换言之，城镇和商业活动是相辅相成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城镇经济的发达程度上，城镇（市场）的规模及其经济容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扩大。城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社会经济发展史和商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具体而微到台湾地区，城镇在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城镇集中了台湾大部分的资金、商业人员以及各种物质资源，是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台湾商品交换和货物流通必经之各级市场。因此，对台湾城镇进行研究可以把台湾经济史特别是商业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清代台湾城镇随着移民开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成长。清代台湾城镇总的特点是规模不大，数量众多，形成高低不同的各级中心市场，商品交换和货物流通过各级城镇得以实现。作为晚开发的岛屿地区，清代台湾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较高，开港前的两岸对渡贸易以及开港后的通商贸易（或称海外贸易）是带动和支撑台湾经济发展的

一股重要力量。开港前,台湾最重要的两大农业生产活动——水稻和甘蔗的种植均具有高度市场化导向,其最终产品米和糖也成为台湾生产和出口大陆的最大宗产品,用以交换大陆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品。开港后,茶和樟脑几乎全部为市场而生产,糖也仍然主要用于出口。这些出口商品的生产在台湾的经济中占有绝对地位。在这种外向型经济活动中,岛上规模不等的城镇,就成为台湾与对岸及海外进行货物交换、流通的市场网络中的结节点。台湾城镇依据其规模大小和等级高低,分别在两岸或海外贸易体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角色。台湾岛上大大小小的城镇,透过两岸或海外贸易活动的货物交易和流通渠道,逐级地建立联结,成为两岸或海外贸易体系中的一环。这种与两岸或海外贸易为主的经济形态,深深影响了台湾城镇的发展,也影响了城镇的网络结构。一般的基层小市镇,作为周边农村地区产品的交易中心,既是台湾商品进入两岸贸易或者海外贸易体系的前端,又是大陆手工业品和海外工业制品进入台湾消费市场的末端。通过这些小市镇,大陆和海外商品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另一方面,台湾商品则可以借此纳入较高级市场,再经过较高级的市场传递,最终到达祖国大陆或海外市场。在最低层级的基层市镇或农村交易市场之上,是规模稍大和层级较高的地方中心市镇,再往上是规模更大和层级更高的地区性中心城镇,最上层的是规模最大和层级最高的区域中心城镇。地方性中心城镇作为一个地方的货物集散和转运中心,它从基层市镇或农村市场中汲取货物,输送到地区性或区域性中心城镇,并换回所需的大陆或海外产品,销往基层市镇和农村市场。地区性中心城镇的货物集散和转运的范围较地方中心市镇大,通常包括一个县所辖的区域,内含几个地方中心市镇。地方性和地区性中心市镇都具有承上启下的转运和集散功能。区域性中心则是台湾最大的城镇,承担与大陆或海外直接贸易的功能,是台湾所有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和中转市场。它既是台湾商品运销大陆或海外的最后一站,也是大陆或海外商品销往台湾的第一站。正是由于两岸对渡或海外贸易在台湾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促使对渡或通商口岸资源的相对集中,从而发展壮大,成为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批城镇。这是台湾城镇发展的一大特点。

同时,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岛上陆路交通困难。台湾河川多缺乏航运之利,但人们仍尽量利用任何可以通行舟楫竹筏的河段载货往来,岛上便形成众多的港口城镇。不过,多数的港口因受条件限制而发展受阻,规模有限。那些地理位置优良、腹地广阔、本身航运条件较好的港口城镇,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成长，其发展速度较一般内陆城镇快得多，成为岛上规模较大的一批城镇，仅次于对渡口岸和通商口岸。

此外，城镇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地理实体，是人口聚集的地方，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它不但具有经济功能，同时也兼具行政、安全防御、宗教、文化、社会保障等多种功能。城镇内的居民在此生产和生活，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举办各种庆典和文娱活动。城镇内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实力团体，按照惯例和律法参与城镇的管理活动。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城镇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因此，城镇研究是清代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台湾社会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过去学者的研究较少涉及清代台湾城镇的内容，更少对清代台湾城镇进行专题的研究。本书试图弥补这一空缺，对清代台湾城镇的发展进程、城镇网络、城镇管理、城镇功能等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

清代台湾商业史领域内的研究已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商业活动集中的城镇，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部分学者在研究清代台湾商业和贸易时，或多或少涉及对市场及市场体系的考察。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本书的完成颇多裨益。大陆学者李祖基在考察近代台湾地方对外贸易后强调，外贸对台湾城镇及其市场体系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他一语中的地指出，“近代以前台湾的市镇结构主要是以那些同大陆有贸易关系的港口城镇为中心”。开港后逐渐出现了以打狗（包括安平）和淡水（包括基隆）为中心的南北两个货物集散地，“并以这两个集散地为中心形成了南北两个大的市场体系”。即，台湾的城镇结构从与大陆贸易的港口城镇为中心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局面转变为开港后以与外国贸易的通商口岸为中心的南、北两大市场体系^①。林仁川和黄福才两位学者则认为，开港以后，台湾传统市场体系逐渐完成向近代意义的市场体系的转变。在他们的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首部专著中，两位学者详细分析了台湾商品市场的演变，指出台湾市场体系根据功能、交易类型可分为三个层次：即以农民活动为主的乡村基层市场、以

^① 李祖基《近代台湾地方对外贸易》，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08-113。（以下所引同一出处将不再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其他注亦同）

小商贩活动为主的初级市场和以大商人活动为主的中心市场（主要从事大宗货物的远途贩运）。而城镇的大量增加是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表现，“城镇、市街等的出现和发展，对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们沟通了城乡市场的联系，使得市场网络功能不断深化，通过它们的辐射、吸纳作用，将更多地方小市场纳入大的市场网络中”。^① 城镇就是较高等级的市场，城镇体系也就是较高层级的市场体系。台湾市场体系的形成演变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有很大启发。林仁川和黄福才关于三个层次的市场结构中的初级市场和中心市场实际上都已形成市街。当然，根据城镇的功能大小，城镇的分层并不止这三个层次，而是依据不同时期市场发育情形，从清初的三级发展到清末的五级。李祖基关于对外贸易在市镇结构中的作用的论述也影响了本书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台湾的两岸对渡贸易和通商贸易不但对城镇及其网络结构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它是清代台湾城镇及其网络结构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由于城镇及其网络结构并非三位学者的研究重点，因此他们对此只作简单论述。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对清代台湾的城镇及其网络体系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此外，台湾学者林满红在探讨茶、糖、樟脑产业与晚清台湾社会时也简单论及城镇。她指出，由于茶、糖、樟脑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茶和樟脑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促进北部山区经济的大开发，导致与茶和樟脑业相关的大批资源型市镇的勃兴，并最终促使经济重心的北移^②。林满红的这一观点，为本书有关开港后台湾城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直接以聚落和市镇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最早有日据时期的日本学者富田芳郎。富氏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台湾市镇的起源、发展变迁及其生活形态。他认为台湾镇的本质是直接依附于周边农村的乡村都市（即市街）^③。他的研究成果在台湾市镇研究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不过，富氏的研究没有涉及市镇网络结构的内容，这也是本书所要补缺之处。

港口城镇作为城镇的一种类型，在台湾的航运和贸易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吸引了台湾学者的目光。其中，林玉茹对清代港口及其体系的研究最

^① 林仁川、黄福才《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80-181；黄福才《台湾商业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03-108、145-159。

^②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页170-173。

^③ 富田芳郎《台湾乡镇之研究》，《台湾银行季刊》，7卷3期。

具代表。林玉茹对清代台湾港口的形成、发展、兴衰及其等级规模体系和体系的变迁过程都做了深入的分析,是清代台湾港口城镇变迁及港口等级系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她认为,台湾的港口呈等级分布,每个港口都有自己的市场范围,并形成一种上下层级关系。她以港口的泊船条件、商业、军事及行政等内部机能作为综合的指标,各项加权计分,确定港口的等级大小,划分出1-5级港口,每级港口都有一定的机能范围^①。林玉茹的港口等级划分法在清代缺乏具体城镇人口统计数字的情况下,是一种较为可取的方法。本研究将参考林玉茹对港口的分级标准,并根据实际运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作为划分城镇等级的指标。另一位台湾学者施添福则从行政和军事的角度考察清代台湾的城镇,他追踪清代台湾行政中心的设置及其演变过程,建构了台湾城镇与行政、军事系统的相对关系。他指出,清代台湾的县厅治所是根据“人文发展的可能中心地点”而设置的,并根据清代台湾县厅衙门人数来推论城镇的规模,以此建构台湾的行政中心系统^②。施添福的这一做法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对本研究中行政城镇的层级划分提供了一个参考指标。不过,施添福与林玉茹的研究一样都有对象的限制,施添福的研究主要限于设置行政或军事单位的城镇,林玉茹的研究对象则仅限于港口,同样缺乏对清代台湾城镇发展的总体把握,对内陆城镇的成长也较少涉及。他们的研究,无法让人一览台湾城镇的全貌。本研究将弥补这一不足,对清代台湾城镇及其网络结构进行全面的考察。

除此以外,有关清代台湾城镇的研究大都将焦点放在个别城镇的发展史上,已经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涉及港口变迁与城镇的兴衰、土地拓垦与城镇的发展、城镇内部的商业组织和商人、城镇商业、人文宗教等等,特别是几个区域性中心城镇的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这些成果对本研究均具有极好的参考价值。不足的是,这些研究着重于微观的个案分析,未对清代台湾城镇做整体的、宏观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尝试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结合起来,既将城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又分析个别有典型意义的城镇。既着重一般,又突出个性。

至于台湾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研究,台湾学者戴炎辉在《清代台湾之

^① 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发展与等级划分》,《台湾文献》,44卷4期;林玉茹《清初与中叶台湾港口系统的演变:扩张期与稳定期(1683-1860)》,《台湾文献》,54卷3期。

^② 施添福《清代台湾市街的分化与成长:行政、军事和规模的相关分析》(上、中),《台湾风物》,1989年39卷2期、41卷1期。

乡治》中详细论述了清代台湾地方乡街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从一般街庄组织到联庄组织），以及基层管理的组织系统。对一般街庄的街庄正（副）和联庄组织的总理、董事，以及街庄内的头人（缙绅、耆老、族长、隘首等）等各级基层乡治组织的领导阶层，以及领导人的任命及其职责等都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同时还探讨了保甲组织在台湾基层社会中的运用^①。戴炎辉的研究对于清代台湾乡治组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本书有关清代台湾城镇管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不过，戴炎辉的研究对象是乡街，并不专指城镇，且其内容侧重于组织体系中的半官方性质的管理机构（如总理、董事、街庄正副等，他们经民间举充，由官谕充），既未涉及官方的组织力量，也未涉及城镇中的其他实力团体（如商业组织、宗族组织、同乡组织等）。官方力量与民间社会组织在清代台湾的城镇事务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官方与民间的组织力量在台湾城镇管理中的互动关系也是城镇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都是本研究力图补足和超越之处。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以往关于台湾城镇的研究尽管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且个别城镇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但仔细检视以往的研究成果，仍有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具体而言，不足之处有以下两点。

其一，长于微观和实证分析，宏观结构分析不够。着重个别城镇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对台湾岛城镇整体发展过程的宏观把握。就正如施添福教授所言，对历史上台湾城镇（市街）的研究，往往只能“限于分布形态的讨论，或仅能就分布特征指认哪些市街是海港、湖港、行政或沿山的交易中心，至于市街的规模、发展或阶层组织，则皆付阙如”^②。即，对全岛城镇及其网络的研究仍较缺乏，大部分研究集中对个别城镇或地方小区域内城镇网络的研究（如施添福教授对兰阳平原聚落的空间结构研究^③），缺乏宏观地、系统地城镇网络结构及其发展动态机制问题的讨论。这样，城镇与城镇之间的联系被隔断，而城镇网络在更大范围内的空间结构也被割裂了，必然导致对台湾城镇发展及城镇网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和“只见木，不见林”的问题。毫无疑问，前人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要从台湾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全方位把握其全貌，则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① 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② 施添福《清代台湾市街的分化与成长：行政、军事和规模的相关分析（上）》，《台湾风物》，39卷2期。

^③ 施添福《兰阳平原的传统聚落—理论架构与基本资料》，宜兰县立文化中心，1997年。

其二，对台湾城镇功能的探讨几乎处于空白，只有少数学者在对个别城镇的分布形态进行分析时涉及对城镇安全防御功能的讨论，如林会承对鹿港街镇形态的研究^①。城镇除了防御功能外，还拥有其他许多方面的功能，均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同时，清代台湾城镇管理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尚待进一步深入，虽然戴炎辉教授关于台湾地方自治体制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他探讨的地方乡治组织，包含了市街的范围，但更主要的是指涉广大乡村地区。究竟市街内部的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的管理组织？官方政策是如何贯彻到基层市镇居民中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因此，仍有必要对城镇的管理体制进行专门的研究，揭示城镇内部的管理运作规律。

第三节 本书分析框架

一、概念定义

台湾城镇：“台湾”这一名词通常指称“台湾省”，有时仅指“台湾岛”。本书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基本上限定在台湾岛内，偶尔涉及澎湖。关于城镇，史学界一般认为，“城”指县厅以上行政中心，因筑有城池，所以称“城”。“镇”多指县以下的商业中心。本书的研究对象包括清代台湾所有的行政中心和商业市镇，因此统一用“城镇”这一概念。

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台湾的商业市镇一般称为“街”，直到日据中期，台湾开始实行市制，才正式有了“（城）市”的社会组织和称谓。日本学者富田芳郎对台湾市镇的定义是“小型的都市”，即“乡村都市”。从行政区域来说，“镇”大体相当于日据时期“市”、“街”、“庄”三者之间的“街”的市街地带（富田氏的研究不包括各级行政中心，即“市”）^②。所谓“街”，即商业集中之地，是“商贾错居者”^③。周玺称：“凡有市肆者”也称“街”，街内“阗阗嚣尘，居处丛杂，人烟稠密，屋宇纵横，街旁胡同曰

① 林会承《清末鹿港街镇结构研究》，《台湾文献》，31卷4期。

② 富田芳郎《台湾乡镇之研究》，《台湾银行季刊》，7卷3期。

③ 连横《台湾通史》，卷五〔疆域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95。

巷”。“郊野之民，群居杂处者，曰村庄，又曰草地，番民所居曰社”^①。简单地说，“街”就是指商业繁荣，人口密集，屋宇众多之处所。与“街”相对的基层社区组织在汉民族居住区称“村庄”，在土著少数民族居住区称“社”。为了表述的方便，台湾的市街和行政中心统称“城镇”，并用“城”或“城池”专指县厅以上行政中心，用“市镇”、“市街”或“街”专指一般商业市镇。

城镇网络：也称城镇体系（urban system），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由一系列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镇所组成，并具有一定的时空地域结构、相互联系的城镇网络的有机整体。城镇网络包括城镇规模、城镇等级（根据城镇的规模大小和功能强弱所划分的由高到低的等级关系。清代台湾城镇可以分为一到五级）、各级城镇的地理分布（地理位置、相互距离及其分布密度）、中心城镇影响的地区或腹地的范围（即市场区）等内容^②。城镇网络是由一系列节点（各级城镇）、线（交通线）、面（区域，即腹地）和能量流（人、货）组成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组成要素的变化，如城镇兴衰、交通线的改变、资源的开发或枯竭等，都会通过交互作用影响城镇网络^③。城镇网络一般有金字塔型、多核型、网络型和带状型等几种类型。其中，金字塔型最为常见，以一个最大城镇为网络内唯一的最高核心（即金字塔的顶点），以下有几个中等规模的城镇围绕，并各自联系若干小城镇和更多的小城镇，形成金字塔结构；多核型，网络内最高的核心城镇不止一个，它们规模相近、引力相当，共同发挥对其他中小城镇的作用^④。清代台湾城镇网络呈现出由清初的金字塔型发展到清中期的多核型（一府二鹿三艋舺），清末演变为双核心形态。

城镇功能：功能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和效能。城镇功能指城镇因为自身的条件和地位而承担和发挥的主要作用和效能。城镇所发挥的

① 周玺《彰化县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156种，页39。（以下所引台湾文献丛刊资料均简称台湾文献丛刊第几种）

② 孙盘寿《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页197；顾朝林认为城镇体系是指体系内各个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联系及其组合状态。从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和社会物质实体——城镇的空间组合形式，也是地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对地域中心的空间作用结果，一般从分布密度、联结形式和形态特征三方面来反映（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201）。

③ 杜闻贞主编《城市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页111；谢文蕙、邓卫编著《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07。

④ 谢文蕙、邓卫编著《城市经济学》，页108。

功能是复杂多样的,本书只考察其主要功能。清代台湾城镇的主要功能包括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安全防御功能,以及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功能。当然,不同类型的城镇所具有的功能侧重不同,不同规模的城镇其功能也有大小强弱之分。

城镇管理:是指为了确保城镇稳定和健康发展以及居民安居乐业,经由官方的以及民间的组织和力量,按照例律、政策、习俗、惯例、约定等等方法来处理城镇内部的日常事务。城镇管理作为“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执行城镇管理的机构和力量、城镇管理的准则、城镇管理的内容。

二、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城镇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景观,是各种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的综合体。城镇研究涉及面广,它涵括了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诸学科,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本书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借助区域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利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城镇发展为课题,以历史过程为脉络,从较长时段的城镇发展和空间演变史的角度,叙述清代不同历史阶段城镇发展及其空间分布、演变的情况。同时,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分析台湾城镇内部的管理结构及其组织功能。

史学方法: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与此同时,城镇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唯有历史学的理论方法才能把握这一发展的动态过程,更好地认识城镇发展变化规律。城镇的发生、发展,及其网络结构的演变等都与特定的时空背景紧密相关,必须将之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本研究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将清代台湾城镇及其网络的历史发展进程置入台湾社会经济史中进行动态的考察。

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城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是在一定地域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地理和生态环境是城镇发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考察城镇特别是城镇网络空间分布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本书主要借用中心地理论及其相关概念。中心地理论是分析城镇网络结构的重要理论。其要点是:任何城镇都具有向其周围地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职能,这些城镇都可看作是规模不等、级别不同的中心地。中心地等级越高,人口越

多,它提供的中心职能越多。同样,中心地等级越高,数量越少,彼此间距越远,它的服务范围也越大。一个地区会形成一套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同等级的中心地有相同的服务范围,也称市场区,或称商品范围,它指人们在一个地方——中心地购买商品而愿意到达的最远距离,也就是市场范围^①。划分中心地等级的指标依据是中心性(Centrality)。中心性是每一个中心地对周围提供服务的性能和地位的指标,克里斯泰勒选用中心地的电话指数作为城市中心性的指标。清代台湾城镇各种统计数字缺乏,无法使用具体的统计指标作为城镇中心性的衡量标准,本书参考学者林玉茹对港口等级的划分标准,并做适当调整,同时综合参考其他因素,如城镇规模和人口标准等,以此划分台湾城镇的等级,在此基础上,进而厘清清代台湾城镇的市场网络结构。

中心地理论大体上是一个静态的模式,它只考虑到体系内服务的层级性,没有考虑到体系与外部世界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对体系的影响,特别是没有将对外贸易因素考虑在内。现实世界中,一个体系时刻都与外部世界存在交换关系,特别是台湾岛这样一个从开发之初就具有强烈的外向性,以两岸贸易和海外贸易为主导的发展形态。中心地理论的静态模式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因此,本书采用长距离贸易模式来解释台湾城镇发展和城镇网络形成的主因。台湾岛开发时间较晚,无法形成自给自足的市场体系,从一开始就存在与外部的交换关系,先是与大陆、南洋、日本进行贸易。清统一台湾之后,以大陆为主要贸易对象。台湾开港后,贸易地区转向以香港、美国、西欧和南洋等地为主,台湾经济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台湾这种以两岸贸易和海外贸易为主导形成的体系不同于克氏研究的德国南部地区(它是在长期的农村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台湾城镇网络体系深受这种贸易关系的影响。由于清代各阶段台湾对外贸易的对象和内容不同,使城镇发展和城镇网络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此外,中心地理论有两个前提假设条件,即“经济人”和“均质平原”^②。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具有这种理想状态的。台湾岛的地形特点,与所谓“均质平原”更是相差甚远。因此,上述克氏理

^① [德] 沃尔特·克里斯泰勒著,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页32。

^② 所谓经济人,指在商业交易中始终以理性的态度处理任何交易事物;均质平原指区域内地形是一片均质的平原,没有地势的起伏,也没有山川的阻隔,从任何一地到另一地,以相同的交通工具在相同距离内所用的时间完全相同。

论中,中心地的规则性分布不可能在台湾出现。

尽管存在上述缺陷,中心地理论有关城镇的中心职能、中心地等级分类、中心地的服务范围,以及中心地的层级性等概念,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可运用于分析台湾城镇网络的空间结构。同时,本研究将长距离的对外贸易因素导入分析框架,避免中心地理论静态模型的不足。这对于台湾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社会构成及其运行规律,具体来说,就是研究构成社会的各要素,各个部分的结构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关系的运动变化过程^①。一个城镇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城镇研究涉及城镇内部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为确保城镇内部的稳定而进行的城镇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和管理,以及城镇所要承担的各种功能。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台湾城镇内部社会组织和社会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工具。

比较研究方法: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大陆有着历史的共同性。但是,台湾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其发展又呈现出它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大陆著名学者陈孔立教授特别强调比较方法在台湾史研究中的运用。通过比较方法,“看出相互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避免只顾共同性忽视差异性,或相反的,只讲差异性不讲共同性的偏向”^②。台湾城镇作为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不可避免的也有着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本书采用比较研究方法,能够更全面地了解 and 掌握清代台湾城镇和大陆部分区域城镇的不同。

城镇的发展和城镇布局离不开具体的地理和生态环境,特别是在古代社会,地理和生态环境对城镇发展及其分布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与此同时,城镇发展及其分布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与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紧密相关,有机联系在一起,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全面的。根据城镇发展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特点,以台湾开放对外国通商为界,可以将台湾城镇发展历史分为开港前和开港后两个大的历史分期,这是台湾城镇从传统城镇向近代意义城镇过渡的一个分水岭。其中,开港前又可分为清初和清中期两个时期。清初以单口对渡为特点,清中期发展为多口对渡。除了必须重现城镇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关城镇的内部管理机制及其功能也是城镇研究的重要

^① 吴增基《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3。

^② 陈孔立《台湾学导论》,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页124。